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8 期 (总 207 期)

2017 年 9 月 5 日

本期要目

特别关注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将出台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

以色列大学校长眼中的“双一流”谈.....(2)

教育探索

人工智能翻译来了，我们还要学外语吗..... (5)

高校焦点

通识教育要立足文化自信，紧密结合专业..... (8)

时政频道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名单揭晓..... (1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将出台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9月1日，在教育部第三场教育金秋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教师教育“振兴”的含义以及今后的具体措施，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予以了回应：“我们正在研制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努力振兴教师教育。”

“近年来，师范院校虽有较大提升，但相比其他类型的高校，发展还是较慢，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地位。有些师范院校想脱帽、想走向综合，有些地方在评估的时候也不充分顾及师范教育的特点。”王定华直指当前师范院校的发展困境。

据介绍，教育部未来将从四个方面入手，振兴教师教育。一是抓规划。科学规划师范生培养的规模结构，确保培养与岗位需求有效衔接，制定各级各类教师培训规划。二是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国家级师范教育基地和一批示范性市县教师发展机构。三是抓投入。提高师范生生均拨款标准，加大对师范教育的投入力度，落实中小学按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四是抓认证。今年将发布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启动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对于认证卓越的师范专业给予更多支持；建设全国教师教育基本状况的数据库，建立教师培养培训质量监测机构，强化教师培训质量评估制度。

“我们既要从源头上进一步办好教师教育，振兴教师教育，又要加大对现有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王定华表示。

据了解，全国教师教育振兴暨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会议已于8月25日在长春召开，会议对推进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7-09-02）

以色列大学校长眼中的“双一流”

——以色列研究型大学校长圆桌访谈

以色列拥有63所高等院校，其中7所研究型大学承担了以色列全部的基础研究，拥有全国80%以上的应用技术专利。研究型大学不仅承担了事关国防、民生的重大科研任务，而且直接参与科技立国和经济发展。以色列研究型大学的教授中有12人获诺贝尔

尔奖，4人获菲尔茨奖和图灵奖。全球闻名的以色列无人机、生物科技、水处理等技术，捷邦（CheckPoint）安全软件科技公司、移动眼（Mobileye）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公司等跨国企业，《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等著名学者都出自这些大学，这些高校的毕业生还创办了以色列80%以上的初创企业。近日，本报的记者走访了以色列5所研究型大学，莫纳汉·本撒松等5位校长就中国高等教育的“双一流”建设、创新人才培养、学科融合与社会服务和中以科研合作等话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并且提出，中以两国高教合作的基点是创新、创业，可以建立教学和科研联合基金合作培养高层次人才，这样双方都将受益。以下摘取学者们的部分观点。

丹尼尔·扎伊夫曼：一流大学应培养应对未来的创新型人才。我相信中以高校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因为每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中国和以色列）都有优缺点。以色列高校和科研制度的优点在于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大学负责培养明天的学者，这些人应该以更广泛灵活的方式接受教育，因为他们将来面对的是今天还不存在的问题，并且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加强高校和科研交流是增强国家联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我建议我们两国能够进一步增加双边科研和教学合作经费，使双方最好的科学家能够加强合作。把经费花给最优秀的人才，而不是集中在某个特定的科研领域。

罗恩·罗宾：创造力不是学出来的。以色列高等教育的特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文化和环境是发展创新思维的两个关键价值，所以创造力培育没有一个“魔法食谱”。但毫无疑问，创新是一个必须培育的品质。

佩雷茨·拉维：大学吸引优秀的学者和科学家也是一门学问。工资、住房和一些物质方面的待遇很重要，但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并不仅仅看重这些。他们更重视的是稳定的工作合同，教学和科研都需要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以色列大学不搞年终测评和末位淘汰，而是严把引进关，只对试用讲师采取5年试用期，其他人员一般退休才离开学校。例如，准晶体发现者、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丹·舍特曼教授，获奖前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工作了8年，8年期间甚至一篇论文都不曾发表过，但我们仍然把他作为永久教授。其次是大学里有没有一种鼓励培养优秀人才和支持创新的文化。前年，我多次去美国说服一位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来以色列工作。我们学校与哈佛大学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相差很大，但如今这位教授工作得很安定。自主和宽松的学术氛围是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应该在科研质量和科学智慧上多下功夫。为了提高创新和研究质量，中国大学必须调整科研结构，让科学家自己而不是行政机构来决定研究的议程。以色列的大学和理工学院总是努力谨慎地保持鼓励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之间的平衡。一旦政策制定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鼓励研究，科学家面临压力只会致力于应用性研究，但一般来说，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就不会出现创新和突破性的发现。杰出的研究必须以好奇心为动力。

莫纳汉·本撒松：一流大学肯定需要引进卓越人才，中国大学前几年从全世界范围内吸引华人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大学之间在名誉、地区之间会存在很大差距，优秀教师和科研人员自然会选择较好的大学。中国大城市和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和南部大学与西安、兰州等地的大学相比，就具有极大的优势。困难地区的大学招优秀人才不容易，而且也容易流失。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每工作 6 年就可以带薪学术休假一年，他们会去欧美研修，会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帮助。所以，我认为中国可以制定一个政策，让优势大学的人才定期到西部困难地区的大学任教，不是做管理人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教学和研究。或者，让优势大学的教师与困难地区大学的教师合作开展教学和科研等。

以色列所有研究型大学都开办了技术转移公司，例如，希伯来大学的技术转移公司负责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专利保护、转让以及融资、孵化等从学校到产业转化的各个环节。技术转移公司是大学的独资企业，校长直接分管，但充分引进市场机制。技术一旦转移成功，大学、拥有专利的教师和公司按照 4：4：2 分成。办好技术转移公司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最直接的途径。

约瑟夫·克拉夫特：一流的大学应该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一般来说，以色列大学遵循“欧洲模式”。例如，大学校长和学术校长都是由教授和师生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选举产生的，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有稳定的工作合同和充足的研究时间。校长和各级行政部门对教授的教学和科研只有评价权，绝对不能自上而下地下命令。创新必定需要自由地质疑以前做过的研究，提出新的思维模式，即使起初听起来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以色列高教发展经验可以为中国“双一流”建设提供的借鉴是，要重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种自主需要一个宽容多元的校园文化，应涵盖不同文化和习惯。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遵循三要素，特拉维夫大学在创建全球百强创新型大学的过程中，主要做到了这三点。

一是跨学科研究。研究型大学要突出科研，但在有这么多复杂问题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科学领域可以提供万能的解决方案。特拉维夫大学近年来创造了一系列稳定的组织框架，如有利于多学科合作的跨学科中心、学院和项目。其中，几年前与清华大学成功合作的纳米科学和技术中心，结合了工程、化学和生物技术等跨学科项目，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二是社会服务，特别是不断扩展大学为当地社会服务的活动范围，建立与商界和政府部门的积极伙伴关系。例如，特拉维夫大学工程学院设立了一个工业联盟计划，与数十家大型跨国公司和以色列的公司开展技术合作。这些公司委托大学开展研究，给我们实验室设备、基金和奖学金，邀请我们的学生做实习生，然后雇用我们的毕业生。与行业建立密切联系的好处是巨大的。这些公司不仅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和学生紧密合作，还使得大学随时了解企业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并使大学保持最新的新兴研究领域。同时，特拉维夫大学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不仅限于商业利益。我们还与以色列教育部密切合作，改进中小学教学课程，引进新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并改善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计划。我们与以色列卫生部合作开展旨在改进以色列公民在较贫困社区饮食习惯的社交媒体计划。我们还与以色列国防部就安全防卫相关的项目进行合作等。

三是全球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特拉维夫大学已经与世界各地杰出教育和科研机构建立广泛合作关系，开展联合研究和其他类型合作。我们认为学校可以更多地从合作中获益，而不是从竞争中获得好处。污染、粮食安全、移民、网络安全和疾病防控等普遍性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自行解决。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现在有 60 多个国家的学生，包括中国学生，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学习。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7-08-27）

人工智能翻译来了，我们还要学外语吗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沃尔玛的机器人已经取代了一些不直接面向顾客的职位，未来，4000 名后勤员工将被机器取代；麦肯锡最新报告预测，机器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取代 30% 的银行员工。

网络外语学习、外语学习软件、机器翻译也给外语学习的传统模式、外语培训市场

以及各类翻译活动带来了强烈冲击。机器翻译正在赋予大众平等且强有力的语言交流能力，语言不通似乎不再是大众探索未知世界的障碍，不再是人们身处陌生环境心理不安的原发因素，有人说，“翻译软件在手，走遍天下都不怕。”

外语翻译软件不像看上去那么“完美”

首先是技术局限性。在今年6月底的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在开场时和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智能机器人“魔镜”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魔镜”能用幽默的话语调侃主持人，它平日的主要任务是做客服，回答问题，还有在教授上课时，担任助教，回答学生的问题。港科大的杨强教授介绍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要通过成千上万的例子来训练，例如：“魔镜”学一个对话系统，需要十万多个这样的对话进行训练。而学生提的问题，如果以前没有出现过，它就不会。“魔镜”的幽默与人类的幽默有着本质的差别，它本身并不会去搜寻新的数据。

作为涉及外语学习以及翻译活动的主要三方——外语学习者、雇佣者和从业者，对待各类翻译软件日新月异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反应。

部分外语学习者心怀憧憬：未来不再需要学习外语，终于可以和背单词练句型的枯燥、写作与翻译的煎熬说“拜拜”，实在“大快人心”！这部分人群在工作生活中可能只会遇到零星外语问题，无需面临外语水平考试的压力，且对外语学习完全不感兴趣。悲观担忧情绪则主要来自外语教育、培训以及翻译从业人员。在“知乎”上一位准备学外语并打算将其作为一项傍身技能的职场新人，便有了如下担忧：“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太快，Siri都可以听懂各种外语了，机器人也可以和人简单对话。我们花费大量精力学的英语，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被翻译软件一举击败？”

现在的人工智能仍然是弱人工智能，就事论事，输入什么数据，它就能依此完成相关任务。翻译软件在专业翻译领域，强大的术语数据库为译者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不过，语言不仅是词汇和语法堆积起来的代码、信息，语言交流还贵在情感和临场应变。它意味着文化差异和一个人性格特点的彰显，每个人表达的特色、倾向与习惯，还是语气声调的变化无穷，这才是语言的魅力所在。人作为具有语言使用自我意识的物种，目前无法被机器取代，只有所谓的“强人工智能”才可能有自主意识，自主决定去学什么，才能够举一反三。所以，在“强人工智能”到来并普及之前，外语学习仍然是达成不同

文化之间交流所必需的前提。

人工智能时代，外语学习要求更高

首先，要区分智能与技术辅助学习部分与只能借由人的自主意识来学习的部分。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徐贲教授指出：人工智能时代，人文教育会变得更加重要，人文教育能帮助我们区分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区分哪些是能被机器取代的人的能力，区分人的机械劳动与想象创造，区分人的知识与智慧。

这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语学习提供了思路。外语学习中，重复机械的部分可以用机器辅助进行，但是与语言唇齿相依的文化习得与人文知识素养等等，仍然有赖于传统的学习模式——大量的阅读、真实的文化浸润以及积极的思考与思辨。

任何技术无法代你欣赏狄更斯作品

人工智能时代的信息爆炸和数据巨流让人们的阅读越来越快餐化，这些阅读资料能够快速达到某个目的，词汇单向、语法直观、结构格式统一化。虽然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效率，但读者“被迫”接受各种即成观点，同时也简化了语言和思维应有的复杂性，正是这些复杂性构成了外语能力的核心方面。比起碎片化的读物，经典文本更多地用暗示的方式隐晦地交代事情发展与人物感情，因此对应的语言表达层次更丰富，词汇、语法、结构模式更多样并更具个性，对阅读者来说无疑是更具效率的一种浸润式学习。而作者的观点留白与细致描摹，更能训练读者的思维细致程度和客观的思辨能力。科技将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技术会替你欣赏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作品。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语学习并未失去意义，反而对学习者的提出了更多挑战和要求。

时下，眼花缭乱的技术让人类掌握多项新技能，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师生在课堂上忙得不亦乐乎，但如果理性分析：教育倒退为流水线程序，师生如同工厂操作员，则丧失了我們一直苦苦追求的教育个性和风格。科技发展让我们节省下来的宝贵精力和时间，不应当被无止境地“智能化”和“机器化”，而是要用于更深层次的人文精神培养和自主意识发展，这才是语言学习的核心所在。

（摘自：文汇报 2017-09-03）

通识教育要立足文化自信，紧密结合专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大学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怎么走？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三届（2017年）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山大学校长罗俊、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重庆大学副校长廖瑞金等对此展开了讨论和分析。

通识教育着眼培养未来人才

北京大学——林建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应该着眼于未来，要避免功利性。作为一个社会人，未来需要迎接社会各种各样的挑战，要在社会很好地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识教育。中国大学应该坚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这也是培养优秀人才非常重要的道路。

清华大学——邱勇：要把通识教育和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结合在一起来考虑。清华历史上的老校长梅贻琦明确提出通专兼顾，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做演讲时曾提出，文理分家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思想的是空心人，只有人文素养而没有现实技术的是边缘人。蒋南翔校长提出“又红又专，全面民展”。这些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对清华很多学生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是清华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点和着力点。

中山大学——罗俊：通识教育不是一个噱头，它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原则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流的大学要培养一流的人才。目前，我们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段距离，对于一个考70、80分的学生可能会特别适合，但对90分和95分以上的天才学生，我们没有特殊的办法，但我觉得，通识教育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天才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学有天才是大学的福气，他的成长在于大学要给他一个环境。

武汉大学——周叶中：通识教育是“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通识教育主要解决四大问题：一是正确价值观的塑造；二是健全人格的养成；三是思维方式的拓展；四是学习能力的提升。

通识教育要与专业教育结合而非对立

林建华：建立通识教育核心课。北大这几年做的教育教学改革，首先就是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既要专业教育进行改革，同时也要做通识教育。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在通识教育中受益的不仅是学生，也有老师。老师们可以从通识教育的理念来重新思考和设计课程，包括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我们开展的经典阅读，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就在学生中间产生积极的响应。学生在面对学校、面对老师的时候，可以用新的方式理解传统的专业知识，有更多的时间选择其他领域的知识，让不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创造效果，得到通识教育的结果。专业教育的改革有个入手点，就是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跨院系选课，增加学生的流动性，建立各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经过改革，院系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原来相比大大压缩了，这样就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余地，给院系更多的开课积极性来吸引更多的学生，拓展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这是我们目前要努力的方向。

真正的通识课，应该放在对于学生拓展视野，树立文化自信，思考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具有反思、批判和创新能力，以及表达、沟通和实践的能力的培养。为此，北大建立了通识教育核心课，希望通过改变内容，改善方法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比如在十几年前做元培学院的时候，开始完全是按照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来做，但马上发现此事在专业教育主导的教育体系中很难做到。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努力，目前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在全校都开始推动通识教育，并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各个专业学科的优势。举例来说，北大如果没有很强的文史哲专业，那么通识教育其实很难搞。

邱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2002年，清华明确提出清华的本科教育体是通识教育为基础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2014年以后，清华提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承“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并进一步提出“通识教育为基础”，后又提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一是强调基础教育就是通识教育，二是强调与专业相通。2013年，清华开始推出一系列课程，包括读写课程，清华的理科学生必须学一门基础的读写课程，清华的文科学生必须学一门基础的理工课程。2017年，清华进行大类招生，大类招生后是大类培养，大类培养有三个内容，新生导引课、专业引导课，还有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作为学校顶层设计课程的主导性安排。当然，我们还进行了另外的实践探索，

在 2014 年正式成立新雅书院，小班教学、通识教育和养成教育结合。这些探索和实践，为我们下一步继续推进通识教育奠定了基础。

许宁生：通识教育重在内涵建设。复旦把推进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关联，最近几年加大力度，对通识教育加强内涵建设，从板块角度做了一些梳理，对课程内容做了提升，并将之称为通识教育 2.0 版。我们最近又在进一步强化，针对“双一流”建设要求，制订了本科教育行动计划，明确了通识教育在整个体系的定位，使它在“2+X”体系里的定位进一步得到明确，下一步还会在课程、教师参与、书院建设、网络慕课课程的建设等方面加强对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总的来讲，从教师到学生，都非常愿意参与到其中去。

廖瑞金：加强创新，加强实践。重庆大学是理工尤其工科特色比较突出的大学，做人文社科和通识有很大难度。2007 年，我们全面提速加强通识教育，要把这个短板补上。我们在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上下了一番功夫，通过“楔行”设计，在通识课程上安排一年级多一点，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逐渐少一点，这样做是根据实际情况，也有利于通专结合，甚至通专融合。在培养目标上，我们也结合了自身的理工特色，提出了要按照人文素养、思辨能力、科学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目标来推进，要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创新实践是我们的四大课程模块，我们也根据理工特色力促向通专融合方向发展并加强实践，发动了很多优秀教授来开设科学技术课程，把这门学科历史发展、脉络弄清楚，还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精神、社会人文、经济条件融合在一起，这样听起来比较有趣，也是向通专融合发展。

周叶中：武汉大学认真理解通识教育，将其积极转化为高等教育实践。“十三五”规划提出“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是一种重大的战略调整。区分不同类型的大学，要区分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又强调要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我认为，这至少有两点：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它对人才的要求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二是传统专业教育的弊端主要在于：将专门人才工具化，将专业教育职业化。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人才各个方面的储备从数学到质量都和过去不一样，这就给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新

的要求，即回归大学本质，立足于人的成长。

通识教育需要立足“文化自信”

许宁生：通识教育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要有本土教育的理念。复旦提倡“复旦特色”，也包含通识教育的要求。领袖人物、行业精英、社会英才，不管哪一类，复旦的要求是他要能够把握未来，把握的不仅是自己的未来，是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从德育优先的角度来讲，“德”是中国自己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总之，通识教育是不是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化，这很重要。通识教育在国外也是从原来的 Liberal art education（博雅教育）发展到 Gen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现在的中国，通识教育则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要有本土教育的理念。下一步除了继续通识教育本土化以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建设中国自己的新的体系。

罗俊：中山大学培养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在未来引领社会的发展。通识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原则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书记讲“四个自信”，尤其强调“文化自信”，我们对学生的培养要侧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普及，要把家国情怀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总书记“四个自信”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我认为在通识课的主干中，中国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是核心。大学要培养一代接班人，这些人今后要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去亮相，他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年代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历史，而是学有所思，学有所感。所以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

廖瑞金：重庆大学强调立德树人，这与通识教育息息相关。现在我们强调立德树人，我认为这和通识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很多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理解不深。正如许宁生校长所说，通识教育应该具有本土特色，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挖掘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获得文化自信，这也是与“四个自信”息息相关。从未来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能做到文化引领，包括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林建华：北大的目标就是给学生更好的教育，引导学生成为懂自我、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的卓越人才。通识教育是件大事情，要避免功利性，需要我们认真、努力去探索，做起来会很艰辛，这就需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担当。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应该着眼于

未来。因此，提升我们的教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要面对未来的挑战，不仅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也包括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更新，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所谓“文化自信”实际是要靠我们民族自己的形象，要靠我们自己的文化创造，让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邱勇：中国和美国的通识教育不一样，美国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通识教育内容不一样，中国清华和北大的通识教育内容肯定不一样。各个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上，把通识教育放在什么位置，怎么理解和实践，要靠大学自己去发展。我认为要有信心，各学校自己去把握，相信五年以后，一定会呈现出非常好的局面。

（摘自：光明日报 2017-09-02）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名单揭晓

9月1日上午，教育部召开第三场教育金秋系列发布会。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名单在会上公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40所高校入选。

据悉，为推动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在高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遴选推荐、教育部组织专家审核认定的基础上，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等40所高校在加强师德考核力度、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完善科研评价导向、重视社会服务考核、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等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较强的示范代表性，遴选推荐为“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

教育部要求各示范校进一步深入推进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切实发挥好典型引路和示范引领作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要认真学习借鉴示范校的好做法、好经验，扎实推进本地本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工作，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破除束缚高校教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高校教师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创新创业活力。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7-09-02）